

制造“十万”：1963—1966年上海知青 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

易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长期以来,1963—1966年上海有十万名知青支援新疆的史实一直存在,并不断被书写、传承。事实上,这种流传是一种基于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综合而成。在此过程中,计划性的人数与实际安置人数之间存在一定误差,因此最终造成人数上的不统一。不过,就当时的动员、宣传而言,计划的人数往往更会被肯定,并在各类宣传报道中将其模糊化(扩大化),从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其实,随着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开展,其人数一直在变动,这无疑会影响最终人数的统计。显然,基于各类档案文献所计算出的人数只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人数,但并不会代替“十万”这一历史记忆。这种基于历史过程的记忆更富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了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知青人数;新疆上海知青;历史与记忆;上山下乡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1)01-0151-11

引言

1963—1966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其中主要安置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新疆兵团”)的人数,一直以来流行“十万”一说,这几乎是大家的共识,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不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不难发现这一数字的不可靠性,具体究竟有多少人目前并不清楚。事实上,这一问题并非新疆上海知青的特殊现象,而是知青人口问题中的普遍现象。据1981年原国务院知青办编印的《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显示,1962—1979年全国共有1776.48万名知青上山下乡。其中,1282.21万人属于插队范畴。在“注”中指出,插队中包括回乡的。^①其实,这一数字也只是对下乡知青人数一个大致的统计,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其一,当时的统计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其二,插队中包括了回乡人数,但这批人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上山下乡;其三,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便已有一些知青上山下乡,这批人未被统计。因此,在既有的中国知青史叙述中,人数不一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一书中,其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长达20余年、涉及人数几达2000万”。^②在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一书中,其认为从1962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③在潘鸣啸(Michel Bonnin)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一书中,其开篇便讲“大

^①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内部出版,1981年印,第1页。

^②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

^③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

约有 1700 万城镇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去”。^① 尽管这与各书所讨论的时段不同有直接关系,但也说明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数争议不小。同样,这一点在各知青团体、知青个人的记忆中也不断形成,从而对知青人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

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数字是如何形成的?有着怎样的基础?换言之,这些数字是怎样算出来的?知青人口究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还是静态静止的概念?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这几个维度进行解剖:一是数字的流传,即目前固定认知的人口数字是如何传开来的;二是数字流传的基础,即数字是如何形成的;三是数字的变化,即人口的流动、增减。对此,本文以 1963—1966 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为例,结合相关档案、报刊、口述等材料,对知青人口数字的形成及记忆进行探讨,从而丰富对知青人口及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十万”的流传与记忆

2008 年 12 月 12 日,上海支边青年^②出身、时任新疆兵团司令员华士飞在给上海支边青年的回信中明确肯定了“十万上海支青在兵团”的功绩。^③ 此时距 1963 年大规模开启动员上海知青支援新疆已有 45 年,但关于支疆上海知青的人数“十万”则已经深入人心,对“十万”的肯定也毋庸置疑。这一点,在既有的叙述中随处可见,诸如地方志、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诸多公开出版的文字叙述中,以及口头、网络等民间叙事都对这一数字不断予以肯定。那么,“十万”这一数字究竟是如何产生并流传开来的?

1963 年 11 月 21 日,新疆兵团负责物资供应的陈明池给当时赴疆考察的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等人写信,提出当时新疆兵团在接收近十万名上海、江苏等地支边青年后,缺乏相应的生活物资,因此请求上海干部回沪后与上海党政领导商议,在此后两年内,每年设法支援新疆兵团三四千万元的商晶,以便把生产和供应工作组织得更好一些。^④ 据笔者所知,这是目前最早可见“十万”上海知青的材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十万包括江苏等地支边青年;且这一数字只不过是计划内的数字,与最终落实到人头上的数字还不一样。无论如何,“十万”这一说法算是在当时的档案文献中留下了一抹印记。1966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批准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当年下半年不再批准青年学生去新疆的意见》^⑤,上海不再动员知青支援新疆。不过,“十万”上海知青支援新疆这一数字却流传了下来。为动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回沪的新疆上海知青返回新疆,1967 年 2 月 16 日《解放日报》刊登《打回新疆去,就地闹革命》一文。文章由新疆建设兵团联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学生赴疆革命造反总部联合起草,指出几年来有“十几万”上海青年奔赴新疆参加建设。^⑥ 由此不难发现,“十万”已然深入广大支疆上海知青的人心,形成了一种共同记忆。

这种记忆通过报刊、文件等不断深化,影响日益广泛。1973 年 5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在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阔步前进,十万知识青年在天山南北茁壮成长》一文,对 1963—1966 年间新疆兵团所安置的“十万多”名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城市知识青年的成长进行了报道。^⑦ 随后,5 月

①[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②支边青年,即支援新疆的内地知青。本文“青年”“社会青年”等均指知青。

③《兵团司令员华士飞为上海支边青年来信上做长篇批示》(2008 年 12 月 12 日),《永远的胡杨》,内部出版,2008 年印。

④《关于请求上海支援技术、物资的信(原件无标题,标题为引者所加)》(1963 年 11 月 2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27-2-784。

⑤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第一室:《市委同意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今年下半年不再批准青年学生去新疆和当前社会青年的安排问题的意见》(1966 年 10 月 8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11-2-71。

⑥《打回新疆去,就地闹革命》,《解放日报》1967 年 2 月 16 日,第 3 版。

⑦新华社:《在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阔步前进,十万知识青年在天山南北茁壮成长》,《人民日报》1973 年 5 月 10 日,第 1 版。

16日,上海《文汇报》对这篇文章进行转载,再次肯定了“十万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茁壮成长”。^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十万”包括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只是“十万”与“十万多”的界限颇为模糊,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十万”上海知青支援新疆。事实上,其中也确以上海知青占绝大部分。无论如何,长期以来关于新疆上海知青的人数“十万”的记忆愈加深刻,在后来的一些文件中也肯定了这一数字。1979年8月13日,在上海市劳动局给各区县劳动局、各主管局下发的《关于本市职工退休招收新疆农场子女问题的通知》中便明确指出:“1963—1966年间,本市动员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去新疆的青年共有近十万人,经过十几年变化,现仍在新疆农场的约四五万人。”^②不过,这里虽然指出了十万的总体人数,但是也强调了人数的变化。这就说明,这其中有一个静态的十万总数,同时还有一个动态的人数。

表1 新疆兵团地方志中关于1963—1966年兵团安置各省市知青情况统计(单位:万人)

地方 \ 人数	上海	天津	武汉	浙江	江苏	北京	合计	原总计
统计(1)	9.7	0.7	0.79	0.48	0.29	0.44	12.4	12.67
统计(2)	9.7	0.79	0.79	0.48	0.29	0.44	12.49	12.67
统计(3)	9.7	0.99	0.8	0.5	0.3	0.44	12.73	12.72

资料来源: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5、1906、1913页。

目前关于“十万”新疆上海知青人数的来源与叙述在地方志(史)中较常见。显然,这些数字受到历史材料的影响,大体与“十万”的流传相吻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志(史)书彼此之间有一定差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说与现实所存在的误差。从上表的统计来看,尽管关于上海知青的人数都是9.7万,但数据之间也有差异。其中,统计(1)(2)均是来自1998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第一份统计来自其“大事记”,第二份统计来自“劳动管理”。统计(3)来自2007年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出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志》,其关于上海知青的统计没有变化,但关于天津的数字则与前两处统计相差2000人。这三份数据显示出关于内地知青人数的统计的确存在误差。不过,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志》1973年5月10日的一则“大事记”中,其关于内地知青的表述仍援引当时的统计材料,称“十余万”知青。^③

从上述数字中不难发现,9.7万与“十万”并无太大差异,且也接近十万,与流传下来的说法相吻合。在《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中,对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十万数字也有确定。国务院知青办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各地知青办的汇总数据,显然,新疆的数据主要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青办。不过,由于新疆兵团在1975—1981年间处于撤销状态,是否会因此造成统计范围过宽不得而知。另外,在统计时限上,超过了1963—1966年的范围,这些因素自然也会影响到统计效果。

表2 1962—1979年新疆安置跨省区知识青年概况(单位:万人)

省市	天津	上海	浙江	江苏	湖北	总计
人口	0.91	10	0.49	1.7	0.8	13.9

数据来源: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第18—24页。

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万知识青年茁壮成长》,《文汇报》1973年5月16日,第1版。

②《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劳动工资处关于转发上海市劳动局〈关于上海市职工退休招收新疆农场子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1979年8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03-4-1072-89。

③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第1907页。

表 3 1962—1979 年新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统计(单位:万人)

年份	插队	国营农场	合计
1962—1966	-	11.95	11.95
1967—1968	0.16	0.99	1.15
1969—1979	22.16	6.4	28.56
总计	22.32	19.34	41.66

资料来源: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第 2—15 页。

1962—1966 年新疆共安置 11.95 万名知识青年到国营农场,此处的统计并未区分新疆兵团与地方国营农场。而在 1962—1979 年新疆跨省安置的知识青年中总数又达到了 13.9 万人。因此,这中间确实存在统计误差。不过,关于数字的流传并未受此影响。尤其是关于“十万”上海知青的叙述更是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诸多文字叙述中,都延续了 9.7 万名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既有表述。^①如前所述,数字之间的统计本身就存在误差,这种误差在地区之间的统计中更加明显。2005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通志》显示,1963—1966 年共有 85155 人赴新疆(含 1961 年、1962 年部分人员)。^②尽管 8.5 万人的规模并不小,占 1955—1966 年上海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的 52%(总人数 164015 人)^③,但与新疆的统计数据相差约 1.5 万人。这种差异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应的考证,厘定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十万”流传下来了而其他数字却难以流传,这些数字与“十万”之间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都需要对支疆上海知青的人数做一个数字计算。

二、人数的数字计算

要进一步厘定支疆上海知青的人数,必须要通过对相关数字的计算,而这又有两方面的数字。一方面是上海的统计数字,另一方面则是新疆的数字。从计算的时间来看,包括计划时的数字和最终人数。因此,根据这两方面材料,大致可以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上海知青支援新疆。

其一,计划人数

据 1964 年初天津市护送支边青年进疆的干部在新疆了解到,新疆计划到 1970 年人口达到 900 万人,净增加 200 万人,其中除一部分依靠现有自然增长外,大部分靠内地支援。其中,新疆兵团在“三五”期间需要内地支援劳动力 50 万人。^④为实现此计划,内地一些省市便开始落实相应的支援任务。经王震(农垦部部长)与柯庆施(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商议,新疆兵团与上海达成了由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青的计划。1963 年 8 月 31 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办公室公布的《“三五”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的初步计划(修正稿)》中确定外迁 70 万人,其中,首先计划安排 22 万名青年到新疆兵团参加生产建设(1963 年 2 万人,今后 4 年每年 5 万人)。^⑤其实,这种计划只是一个总体规划,在每年动员安置工作中还有更为细致的安置计划。

表 4 安置计划总计人数为十万,也正好印证“十万”上海知青这一数字。关于计划数字的来源,当然不止上述材料。而且,在做计划的过程中也有反复调整,并最终确定上述数字。1964 年 2 月 7 日,新疆兵团农一师师长李华仙在给上海市劳动局领导的信中表示,当年兵团原本计划安置上海青年

^①尽管都是 9.7 万名上海知青,但在不同文本中对数字的统计时限却不同。有的是以 1961—1966 年为时限,有的则是以 1963—1966 年为时限。若不去追踪背后的差异,显然会影响到数字的有效性。

^{②③}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第 2200、2205 页。

^④天津市劳动局等:《关于去新疆为我市社会青年寻找安置门路和护送支边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1964 年 2 月 10 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401206800-X0053-C-002005-001。

^⑤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的初步计划(修正稿)》(1963 年 8 月 3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62-1-22。

2万人,但2月3日接到农垦部部长王震的电话指示,确定要给3万人指标。^①3月7日,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公布的减人方案中,计划动员3.5万名上海青年到新疆兵团。^②同样,在1964年12月8日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印发的《关于1965年本市安置社会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的计划》中,确定动员到新疆1—1.2万人。^③但在1965年2、3月,又先后确定动员人数为1.5万人、1.3万人。^④这就说明,新疆兵团接收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计划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变化一直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之中。

表4 1963—1966年新疆兵团计划安置上海青年人数(单位:万人)

时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合计
人数	2	3.5	1.5	3	10

资料来源:《关于上海市社会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1963年8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7-1-149-1;上海市委精简小组:《上海市1964年减少城镇人口工作方案》(1964年3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62-1-27;《对1965年动员工作的排队摸底(原件无标题,标题为引者所加)》(1965年2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1-1095;《1966年动员青年参加新疆军垦的工作方案》(1966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62-1-36-22。

1964年上海支援新疆兵团的知青人数是上海和新疆兵团商议的结果,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才最终确定3.5万人。^⑤与此同时,中央对全国的安置计划都有直接掌握和调整。1965年的全国安置计划就是由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最终公布的,确定安置到国营农林牧渔场10.33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1.5万人、武汉市0.4万人、天津市0.4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置江苏省1万人。^⑥这也印证了1965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青1.5万人的计划。同样,1966年的安置计划也由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公布,确定当年安置到国营农场10.37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3万人、武汉市0.7万人、天津市0.7万人、唐山市和保定市各0.05万人、浙江省0.5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置江苏省1万人。^⑦1966年新疆兵团确定安置上海市3万人的计划既受到此前几年安置工作,尤其是1965年安置工作的影响,更与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有直接关系。1965年7月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到新疆视察,周恩来对新疆兵团安置上海青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指出今后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3万人。^⑧

①《上海市劳动局、新疆自治区劳动局、新疆建设兵团各单位关于新疆要求支援技工工资待遇问题的来往函》(1963年12月—1965年8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27-2-784。

②上海市委精简小组:《上海市1964年减少城镇人口工作方案》(1964年3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62-1-27。

③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关于1965年本市安置社会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的计划》(1964年12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62-1-27。

④《对1965年动员工作的排队摸底(原件无标题,标题为引者所加)》(1965年2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1-1095;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市妇联:《关于1965年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军垦的工作意见》(1965年3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1-1095。

⑤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关于动员上海青壮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的工作意见》(1964年4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62-1-27-25。

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1965年安置计划的几点说明》(1965年4月20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2-017-00054。

⑦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1966年安置计划》(1965年12月1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2-068-00080。

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对兵团重要指示的报告》(1965年7月11日),农垦部政策研究室、农垦部国营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农场研究室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744—745页。

事实上,在安置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对安置计划做进一步的修正。1966 年 7 月 2 日,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办在《关于 1966 年上山下乡计划的初步意见》中指出,动员 1 万名上海青年赴新疆兵团如果全部由市区完成可能有困难,因此必要时在近郊集镇非农业户的社会青年中动员一部分。^①而关于郊区的安置计划,早在当年的 3 月 14 日,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就在当时召开的郊县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动员 1000—2000 人支援新疆。^②只不过当时所指新疆并未明确表示是新疆兵团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随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确定要从上海招收青年 3400 名参加自治区地方国营农林牧场建设^③,但在当年 7 月 19 日公布的计划表中,安置人数又变更为 2310 人。^④

其二,实际人数

计划归计划,它虽然对每年的动员安置有指引作用,但实际动员工作开展后的人数往往会在计划上下波动,造成与计划数字的出入。1964 年上海市杨浦区动员支援新疆兵团的计划为 2600 人,最终动员了 3039 人。^⑤1965 年杨浦区计划动员 1500 人,但最终动员了 1632 人。^⑥当然,有超额就有缺额,完不成动员计划也在所难免。不但上海的个别区完不成任务,而且上海的整体任务也未必就能完成。从北京市来看,1965 年计划上山下乡安置 2.01 万人,但截至当年 9 月底共安置 1.03 万人,占总任务的 51%。其中,计划支援新疆农场 600 人,完成 159 人,完成比为 26.5%。^⑦

表 5 1962—1966 年新疆兵团实际安置上海知青人数(单位:人)

时间	1962 年	1963 年	1964 年	1965 年	1966 年	合计
人数	400	19730	31861	13800	17000	82791

资料来源: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动员上海市社会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文件》(1963 年 8 月 2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76-3-1132-68;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 1963 年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总结》(1964 年 2 月 18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2-2266-1;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关于请求补拨 1964 年安置费的补充报告》(1965 年 7 月 28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藏,档号:004-05-0350;《动员社会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思想教育工作总结(初稿)》(1965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1-1095;《关于新疆未批准的一万二千人青年的情况》(1966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2-2898。

由上表可以得出 1962—1966 年新疆兵团大约安置上海青年 8.28 万人。这一数字与前文的“十万”计划有 1.72 万人的出入。不过,这却比较接近新疆兵团在 1973 年 12 月 2 日的一份统计材料。而且 1974 年上海市赴新疆学习慰问团的反馈材料也显示,其在新疆慰问的上海支边青年人数为 8 万多人。^⑧ 尽管这一数据的底本可能就是 1973 年的统计,但也说明了其数据的可信度极高。

①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关于 1966 年上山下乡计划的初步意见》(1966 年 7 月 2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62-1-36。

②上海市劳动局:《李德鸣副局长 3 月 14 日郊县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记录稿)》(1966 年 4 月 14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27-2-870。

③上海市教育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郊区城镇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地方国营农林牧场生产建设的工作意见》(1966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05-4-26-104。

④《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国营农牧场招收青年任务分配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05-4-26-106。

⑤杨浦区劳动局:《关于 1964 年动员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情况和 1965 年的工作计划》(1965 年 3 月 29 日),杨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不详。

⑥杨浦区劳动局:《杨浦区 1965 年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军垦建设工作总结》(1965 年 11 月 13 日),杨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不详。

⑦北京市劳动局党组:《关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请示报告》(1965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不详。

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将赴新疆学习慰问团携带的电影放映机和影片拷贝等赠给新疆建设兵团的请示》(1974 年 11 月 18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244-3-605-40。

表6 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分配情况(1973年12月2日)(单位:人)

时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合计
人数	19869	31443	14431	15655	81398

资料来源:《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分配情况》(1973年12月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藏,档号:004-07-0363。

尽管经过1966—1973年7年的时间,人数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从每年安置的统计人数来看,总体人数大体不差,上述数字应属可信。而且针对安置人数上海和新疆都有相应的统计,这一点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数字相契合。1965年12月,上海赴新疆慰问团对新疆兵团上海青年的统计发现,从1963年至当年新疆兵团共有上海青年64898人(这一数字与笔者根据统计列出的数字计算有出入,计算得出的人数为65358人)。^① 同样,1966年3月18日,团上海市委在给中共上海市委和团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1963—1965年共有6.4万名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兵团建设。^② 其实,由此不难发现,至少在1963—1965年间上海青年的数值大概在6.5万左右无疑。问题主要出现在1966年的人数上。

1966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复同意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下半年不再动员组织青年去新疆、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再进行的建议。10月26日,最后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出发赴新疆参加建设。由于“文革”全面爆发,上海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的工作不得不终止。^③ 由此,当年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人数统计出现了较大问题。因为1963—1965年期间每年的数字在档案文献中都有详细统计,而1966年的工作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下半年的数字比较难找。根据当时上海的档案材料记载,截至1966年7月2日,共有上海青年2.7万名报名,但新疆兵团当年上半年的招收计划为1.5万人,对此,有许多已经报名的上海青年不能被批准。截至6月29日,已经批准1.3万人,占报名数的48%。根据杨浦、徐汇、普陀、静安、长宁5个区的审批情况来看,报名10219人,已批准5790人(超额390人),占报名数56.6%。据其中4个区估计,还可以批准700人,占报名数的7%。由此推之,全市可批准数约占报名数的63%,达到1.7万人。^④ 当然,在档案中,上海负责动员的部门也反复提及新疆兵团要求严格控制人数,因此大约有1.2万名青年不能被录取,要求各部门必须做好这1.2万名不能录取青年的善后工作。为统计之便,笔者对1966年的数据采取了当时计算的最大值1.7万人。根据此前下半年动员工作以应届毕业生为主的原则,当年也同样如此,要求动员一定规模的半工半读学生,但这批学生对支援新疆有抵触。1966年6月12日,杨浦区劳动局对所属94个半工半读(职业学校、工读班)学校调查发现,学生中仍存在不愿到新疆去的思想,他们认为半工半读学生也要去新疆是想不到、想不通、不搭架的,不少学生说:我们是在学青年,与社会青年两回事,因此要动员我们是想不到的,也是想不通的。^⑤ 随着“文革”不断推进,下半年的任务自难完成。

在知青人口数据中,实际上有三个数字,一个是计划数字,一个是动员数字,一个是最终批准数字。一般看来,这三个数字都在不断变动,尤其是随着动员工作的开展,动员数字更多。在1963年夏季,因为动员工作有序开展,所以两个月内就有4.5万名青年报名。^⑥ 由于受到计划数字的限制,故最终批准的数字必须在计划范围内。尽管上海每年的实际输送人数并未超过计划数,但这并未影响

①《上海青年在新疆基本数字》(1965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2-2556。

②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军垦的工作报告(初稿)》(1966年3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1-1141。

③谢敏干编:《新疆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年大事记(1963—2003)》,珠海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④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青年工作部:《必须积极地、慎重地做好参加新疆建设未被录取的一万二千名青年的善后工作》(1966年7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2-2898;《关于新疆未批准的一万二千人青年的情况》(1966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2-2898。

⑤杨浦区劳动局:《关于半工半读学校教育动员学生支援边疆建设的情况汇报(草稿)》(1966年6月16日),杨浦区档案馆藏,档号:47-4-132。

⑥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1963年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总结》(1964年2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2-2266-1。

新疆兵团完成中央的安置任务,因为它不但要安置城市青年,还要安置复转军人及其家属。根据国务院计划,1964 年新疆兵团应接收安置内地城市青年 3.5 万人,复员军人 2 万人、家属 1 万人,实际安置上海城市青年 31861 人、武汉城市青年 2459 人,未突破计划;实际安置复员军人 23754 人、家属 13734 人,分别超计划 3754 人、3734 人;合计超计划安置了 6808 人。^①

通过上述计算可知,1962—1966 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青大约有 8.3 万人。但据地方志记载,从 1961 年 8 月 20 日至 10 月 25 日,新疆兵团各类学校和训练班在上海招生 2460 人。^② 同样,截至 1962 年 12 月,前后参加农一师的上海知识青年有 600 多名。^③ 196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又计划在上海招收二三千名青年。如此算来,上海支援新疆的知青人数大约有 9 万人。若包括其他零星支援人数,“十万”自不成问题,甚至超过“十万”也不无可能。不过,在计算数字时,档案文献与地方志仍存抵牾。笔者根据新疆兵团师一级地方志对上海青年人数进行相关统计发现,1961—1966 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青年大约有 7.2 万人。^④若根据团一级的统计数据计算结果则更少。造成这种现象,与地方志所引用的数据本身、时间等因素有关系,但笔者以为,这也受到知青人口流动、增减的影响,因为自上海知青进疆之后,其流动即已开始,所谓“十万”也好,8.3 万人也罢,并非铁板一块。

三、人口的流动、增减

其实,从前文两份关于人数的计算数据中便不难发现人口的流动。这种流动既有新疆内部流动,同时也有跨区流动。这期间既有政策的影响,也受到“文革”爆发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影响。因为“文革”及知青回城的影响,新疆的上海知青人口有三次比较大的变动:第一次是“文革”爆发后不少上海知青回沪,第二次是 1973 年因“李庆霖上书事件”所带来知青政策调整,一些上海知青回沪,第三次则是 1979—1981 年知青大返城所带来的大规模上海知青回沪。

“文革”爆发后下乡知青回城闹革命,大批新疆上海知青回沪,具体有多少则难以计算。截至 1969 年 4 月,在上海的支疆知青大约有 1 万余人,其中有五六千人在沪的时间已经超过半年甚至 1 年,其余的则是 1968 年以来因探亲、事假、病假等来沪。^⑤ 通过反复动员以及提供相应的路费帮助,其中不少人先后返回新疆参加劳动生产,但也有不少人留在内地。截至 1974 年 3 月,仍有 2700 名上海知青留在内地,其中留在上海市 1500 人(市区 1300 人、郊县 200 人),1200 人已到江苏、浙江等地农村结婚。^⑥ 这些人最终大抵还是在内地留了下来。

受中央对知青政策调整的影响,自 1974 年开始有不少上海知青从新疆“病退”回沪。1974 年,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团支边青年工作部门和上海市劳动、知识青年工作部门商定,本着从严掌握的原则,对上海支边青年中确实患有严重疾病、不适应继续在新疆工作的少数人,经医院证明,安置单位审核,报上级安置部门同意,可按病退处理回上海安置。天津、武汉、北京等城市的支边青年也按此办理。1974—1977 年,支疆上海青年中按病退处理的有近 1000 人。^⑦但是,据支疆上海知青卢孝立回忆,其在 1963 年 10 月 9 日进疆,分配在农二师塔里木二场蚕桑一队,先后从事农工等工作,他在 1973 年被调回浙江奉化。^⑧ 其回城究竟是受到“病退”回城的影响,还是零星的个别回城,尚需进一步追踪

^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关于请求补拨 1964 年安置费的补充报告》(1965 年 7 月 28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藏,档号:004-05-0350。

^{②④⑦}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第 2211、1926、2010、2011、2044、2047、2073、2099、2133、2134、2158、2166、2173、1909 页。

^③《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招收上海知识青年培训蚕桑技术工人的宣传提纲》(1962 年 12 月 6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21-2-2031。

^⑤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动员在沪支疆青年回新疆车费问题的请示报告》(1969 年 7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7-4-63。

^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对市劳动局革委会〈关于去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请示〉的抄告单》(1974 年 3 月 6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246-2-1018-54。

^⑧卢孝立:《定了,去新疆》,《红柳花盛开的时候——原农二师塔二场上海知青亲历》,自印本,第 1 页。

分析。因为从1970年开始,大、中城市便陆续接收知识青年“病退”,各地知青安置部门对允许病退的疾病种类和程度作了临时性规定,并且要求病退者须持有相关医院的诊断证明。当然,“病退”也逐渐演变成知青回城的一种策略和方式。当返城大潮涌动时,大批下乡知青返城,也点燃了支疆上海知青回城的激情。在此过程中,支疆上海知青回城的时间要晚,过程更曲折,但也有不少上海知青因此最终离疆返沪,引起了支疆上海知青人口的急剧变化。

表7 上海支边青年情况综合统计表(1981年10月10日)(单位:人)

单位	总计	男	女	党员	干部	未婚人数	已婚人数	夫妻双方为上海支青	一方	户数	子女
农垦一团	1822	952	670	180	147	28	1794	830	866	1077	2589
农垦二团	1573	808	765	118	133	69	1616	772	673	1203	2036
三团	2020	949	1071	135	179	255	1765	1477	388	913	
四团	1292	640	652	79	159	32	1260	698	562	711	1794
五团	1859	1065	794	92	160	87	1772	569	634	1203	2179
六团	698	388	310	63	85	18	680	412	268	474	
七团	1399	716	683	76	107	77	1274	924	370	871	1589
八团	752	405	347	52	74	12	738	465	273	372	558
九团	1326	685	641	66	113	8	1318	1078	240	659	1225
十团	1246	684	562	74	146	12	1234	888	346	617	1110
十一团	611	362	249	85	48	45	566	356	210	397	647
十二团	2211	1205	1006	162	197	143	2018	1428	590	1338	2236
十三团	2146	1138	1008	128	152	101	2045	1653	587	1216	2276
十四团	1152	626	526	71	85	95	1044	926	242	580	1119
十五团	1404	789	665	44	69	109	1216	788	265	680	1319
十六团	1730	969	761	87	176	31	1699	1057	662	1171	2043
红旗坡团场	52	23	29	7	8	1	51	37	15	35	64
建化厂	1001	606	395	111	121	113	888	588	300	652	995
工程团	456	239	217	31	44	30	426	224	202	213	595
农科所	161	87	74	9	10	8	153	59	63	113	225
阿克苏地区第一运输公司	152	74	78	12	18	9	143	90	52	110	218
阿克苏农机厂	82	30	52	9	19	0	82	48	34	58	123
针织被褥厂	36	11	25	6	8	0	36	8	28	33	58
——	39	21	18	5	6	1	38	19	19	30	55
粮油二厂	12	6	6	2	3	0	12	7	5	12	23
XXX	12	3	9	2	5	0	12	1	11	12	20
XX供应站	6	5	1	1	2	0	6	1	5	6	8
沙X农场	1	0	1	0	1	0	1	0	1	1	3
农牧连	16	5	11	1	2	0	16	8	8	13	21
畜牧XX所	3	1	2	0	2	0	3	1	1	2	3
合计	25270	13492	11628	1708	2279	1284	23906	15412	7920	14772	25131

资料来源:兵团司令部:《上海支边青年情况综合统计表》(1981年10月1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藏,档号:004-04-0725。

上表是 1981 年 10 月 10 日新疆兵团司令部对上海知青“回沪”“返疆”的情况统计表。如果以总数计,总共有 2.53 万人回沪,其中,夫妻双方为上海知青的达到了 1.54 万人。^①此时的统计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当时正值支疆上海知青返城的关键时期,政策还在调整。据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新疆通志·民政志》记载,截至 1985 年底,先后离开新疆的内地知青共有 8.55 万人,继续留在新疆的支边青年共计 4.12 万人,其中,上海 3 万人,北京、天津共计 0.31 万人,武汉 0.23 万人,江苏 0.13 万人,浙江 0.14 万人。^②这就说明,至少有 5 万余名上海知青离开新疆。如果包括家庭成员,离疆人口显然更多。

一直以来,上海知青在新疆内部也不断流动,有人调到自治区(地方),有人在兵团内部调动。1968 年,上海女知青冯菊娣到吉林延边插队,因她在农村挣工分,口粮又少,所以于 1976 年通过投亲的方式找到其在农十师八团农场的姐姐,并得以安置在该场。^③为解决上海知青的个人婚姻问题,1974 年 9 月 8 日,新疆兵团党委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提交报告,指出:“在 1963—1966 年安置在农一、二、三师的 6 万名上海支边青年中,大部分都已结婚,但由于近几年来女知识青年有一部分在内地、一部分在新疆地方上、一部分在兵团内部工矿企业、机关等事业单位找了对象,致使约有 1.4 万余名上海男青年‘无象可对’。他们目前年龄已经很大,因此,兵团党委希望他们能到兵团以外寻找对象,结婚后可安置在兵团内部。”^④上海知青的流动有工作、婚姻等需要,同时,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平心论之,知青大返城情况的出现,新疆上海知青有其苦衷,不过,这也确实影响到了新疆,尤其是新疆兵团的人口变动,至少在短时期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留下来的 3 万余名上海知青大多数坚持到了退休才回沪,也使得新疆兵团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他们在新疆兵团、新疆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 论

显然,“十万”上海知青支援新疆既是一个实数又是一个虚数。所谓实数,说明这个数字确实存在当时的文件、报刊、报告等各类文献中,通过计算所得出的数字。所谓虚数,说明这个数字更富有一种象征意义,具有文化符号价值。这两点特征在知青人口问题中贯穿始终。值得注意的是,虚实是一个交织的过程,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并最终通过一个虚数显示出其在人口史上的意义。由于当时处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口数字也在计划内。同样,这种计划是模糊性和精确性的统一。1965 年 7 月,周恩来在新疆考察时对新疆兵团作出指示,要求兵团补充 7—10 万人,即复员军人 2 万人,上海城市青年 3 万人,天津 1 万人(照顾河北 1000—2000 人),武汉 1 万人(照顾湖南 1000—2000 人)。^⑤针对这一“精确”计划,1966 年 5 月 17 日,新疆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在上海作动员报告时也进行了“模糊性”的阐释。他指出,“中央给上海市的任务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今年只能去三万人,也可以多一点,假如说今后能够去四万、五万,一年能够去上十万、二十万人那就更好了”,“现在我们要一年接收几十万,暂时还没有这个力量”。^⑥同样,对实际赴疆的知青人数统计也存在类似情况。1965 年 5 月 26 日,上海《解放日报》刊发文章肯定了两年来(1963—1964 年)5 万

①以此计之,夫妻双方为上海知青,是否意味着共有 3 万余名上海知青回沪。当然,这是统计中所出现的问题,需进一步讨论。

②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第 1783—1784 页。

③冯菊娣:《从吉林到新疆》,李诚奇主编:《胡杨树下的故事》,自印本,2012 年,第 189—190 页。

④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关于农一、二、三师一万四千名上海支边男青年婚姻问题的请示报告》(1974 年 10 月 16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藏,档号:4-3-36。

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对兵团重要指示的报告》(1965 年 7 月 11 日),农垦部政策研究室、农垦部国营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农场研究室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第 744—745 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同志在“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报告大会”上的报告记录(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1966 年 5 月 17 日),《团的情况》,单印本文件。

多名上海青年赴新疆参加建设的革命壮举。^①这一数据显然是相对精确统计的结果,但是在当时的报刊中,虚数往往更多,也更富有宣传、象征意义。6月5日,《解放日报》刊发的社论文章《青年们,到边疆去干革命!》开篇便指出,“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祖国号召,奔向边远的新疆,投入革命斗争的激流,这是广大青年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步革命化的表现。”^②

诚然,在广大支援新疆建设的上海知青以及当时经历过这个工作的相关人员记忆中,所呈现出的都是“十万”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记忆。而在整个知青群体的记忆中,则又呈现出2000万、1700万等数字。在计算人口时,造成人口差异的原因与统计时间、范围有关,但模糊记忆一般会将最大化的人口计算在内,不断形成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传承开来。必须承认,知青人数的统计是记忆的前提和基础,而且通过这些统计计算会更加接近真实的数字,譬如1963—1966年上海知青的人数更符合9万人左右,虽然这在估算支援新疆的上海知青人口价值、人数分布等方面可能更有意义,但这并不会代替大家的共同记忆。团上海市委原书记张浩波认为:“实际上也就是八九万。中国人喜欢十,十全十美。”^③在黑龙江上海知青刘训付的眼中,也认为是“十万”上海知青去了新疆。^④他们都认为这么大批的上海知青奔赴新疆,“确实是壮举”,值得敬畏。这就进一步说明,“十万”这个虚数代表了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壮举,是对其业绩的高度肯定,成为了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不断被书写、记忆、传承。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5ZDB0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易海涛(1989—),男,四川仪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Manufacture of “100,000”: Shanghai Educated Youth Support Xinjiang and Historical Memory during 1963 to 1966

YI Hai - tao

(The Institut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historical story of 100,000 Shanghai intellectual youths supported Xinjiang during 1963 to 1966 has been narrated. In fact, the narrative was a synthesis based on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During the process, there was some errors between the planned data and the actual resettlement data,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onclude the final data. However, the planned data was more often affirmed, and based on this, a positive social atmosphere had been formed. Further, as the Shanghai educated youth began to support Xinjiang, the changing number would undoubtedly affect the final number of people. Obviously, the number calculated based on various types of files would be closer to the actual number, but it cannot replace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100,000”. The symbolic historical memory represent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broad social influence of Shanghai’s intellectual youth in supporting Xinjiang.

Key words: number of educated youth; Shanghai educated youth in Xinjiang; history and memory;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①《敢教日月换新天 誓把戈壁变绿洲 五万上海青年在新疆建设中大显身手 两年的劳动开垦了大片荒地 涌现了大批五好工人和生产能手》,《解放日报》1965年5月26日,第2版。

^②《青年们,到边疆去干革命! (社论)》,《解放日报》1965年6月5日,第1版。

^③张浩波口述,林升宝、易海涛访谈:《到江西去、到新疆去——张浩波动员青年支援外地工作琐忆》,《青年学报》2018年第1期。

^④刘训付口述,林升宝、易海涛访谈:《黑龙江上海知青眼中的知青回城及知青工作——刘训付先生访谈》,《青年学报》2018年第3期。